

重新定位,抑或三位一体?

——论比较文学、翻译学和文化研究的关系

谭惠娟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 以往人们一般都将翻译和翻译学视为小道,认为它只是比较文学的工具。接受美学和解构主义文化思潮打破了关于原文与译文的尊卑等级观念,认为翻译并非只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实际上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翻译学并非只是研究语言转换的技巧,而是要研究翻译过程中包含的复杂的文化问题,从而大大提高了翻译和翻译学的地位。20世纪中后期,文化研究思潮兴盛,研究者着力探讨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比较文学和翻译学研究受其强烈影响,并因此实现了“文化转向”,开始注重探讨不同文本、不同语言系统背后的文化内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经过蜕变的翻译学研究领域得以加广加深,观察剖析翻译过程和翻译目的被视为探讨各种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重要阵地和最佳途径,它在一定程度上挤占和取代了比较文学的地位和功能,比较文学和翻译学因此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迈入新世纪后,文化研究、比较文学、翻译学各自的特征和相互关系又有新的发展,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工合作的局面。有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已经过时,翻译学将居主要地位,是否如此,尚难断言。

[关键词] 比较文学; 翻译学; 文化研究; 重新定位; 三位一体

[中图分类号] I207; K20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6)01-0133-09

比较文学、翻译学和文化研究是近代以来文学和文化研究学科的三个重要分支。它们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可以用“剪不断,理还乱”来形容。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发展过程进行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三者各自的特征及其发展变化轨迹,并准确把握当代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向。欧美学者早已不再把它们看成互不相干的几个领域进行分别研究,而是注意到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对这种复杂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趋向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思考,也有不少成果面世。本文即拟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就这个问题略陈浅见,以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进一步探讨。

在比较文学、翻译学、文化研究三者之中,文化研究的概念出现较晚。比较文学和翻译学则基本上是相伴而生的,可算是一对先后落地的双胞胎,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们的处境都不妙,

[收稿日期] 2005-09-13

[本刊网址 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 浙江省教育厅 2005 留学回国人员专项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谭惠娟(1962-),女,湖南长沙人,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及西方文学翻译理论研究。

因此又可以称得上是难兄难弟。当然两者面临的具体问题有所不同:自比较文学诞生之日起,就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一直伴随着它,即认为比较文学实质上应该是文学比较,它只是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并不构成文学研究的一个单独学科。于是称“比较文学”为一个学科的说法一直遭到怀疑和嘲笑。法国学者布吕奈尔说:“比较文学长期以来被人带有轻蔑和嘲弄地认为是稀奇和难以理解的专业,因为它具有表现出最大思想混乱的学科特点而在暗淡的光景中进行着。”^[1] 翻译学的血统倒似乎没有人怀疑,但它被普遍认为是文学研究以至整个人文研究大家族中的庶出,身份低微。人们认为翻译学就是研究翻译中语言转换的技巧问题,不是什么大学问。受这种观念的影响,翻译学在整个人文研究学科体系中的地位一直不高,如我国直到1992年才将“翻译学”列为一门学科,而且还只是语言学(一级学科)下的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三级学科^[2]^[185]。

最令人感慨的还不是其他学科的学者对比较文学和翻译学的质疑和奚落,而是比较文学学者对翻译学的轻视。翻译历来被认为是一种工具,只是为研究(包括比较文学研究)作准备,翻译本身并没有取得独立的学术地位。苏珊·巴斯奈特教授是这样描写两者关系的:“比较文学与翻译学的关系,向来颇为复杂,引起了不少争论。传统的看法是把翻译视为穷亲戚,视为雕虫小技;译文中的地位,通常也比原文低。比较文学理论家虽然承认翻译对他们的研究工作有所贡献,但又普遍认为,直接阅读原文才是上上之策。”^[3]^[187]

比较文学与翻译及翻译学的不平等地位的形成,还与它们诞生之初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比较文学诞生于19世纪初的法国,并形成了所谓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1810年,斯达尔夫人出版了《论文学》和《论德国》两部著作,大力倡导比较文学研究。她向法国读者介绍歌德和席勒等著名作家,认为德国文学可以使法国文学从对古典文学的毫无创造性的模仿中摆脱出来,因此她也特别重视翻译。斯达尔夫人于1816年在意大利的一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论翻译的精神》的论文,对翻译给予高度评价。文中说:“对于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来说,没有比将人类智慧的杰作由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更值得做的事情了。”^[3]^[24] 她赞扬意大利翻译家文森佐·蒙蒂(Monti, V)翻译的《伊利亚特》,对极富表现力的意大利语也十分赞赏,并鼓励意大利翻译家们多翻译现代欧洲作品。她认为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可以引入另一种语言中的词汇,另一方面为了翻译的需要又必须不断挖掘目的语中的日常语言词汇,这样目的语的语言词汇就可以大大得到丰富。

但比较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种关在象牙塔中的纯学术,而是直接或间接地与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相关。当时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民族主义,比较文学的主张与民族主义思想是相冲突的,因此法国比较文学研究早期步履维艰。斯达尔夫人力图借助翻译引进其他国家的文学,以丰富和充实自己同胞的思想,要冒很大的风险。她的书在拿破仑时代遭到销毁和禁读,她本人也被赶出巴黎。既然翻译在当时与意识形态斗争搅在一起,遭到官方严加管制,成了一个敏感话题,因此,当时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们宁愿在自己的书中介绍异国的作品和思想,也不愿意将原作翻译成本国语言介绍给读者。当时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欧洲学者实际上还将研究的范围局限于欧洲。既然他们的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而他们大多又懂几种欧洲语言,因此也就不觉得翻译有多么重要,甚至不觉得翻译有什么必要。他们强调读原文,在他们看来,读译作总不如读原文好。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浪漫主义有着很强的天才和精英意识,他们并不主张翻译研究,他们认为,只有天才作家才能翻译天才作家的作品,就这样,他们给翻译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早期的比较文学就是在这种阴影下发展起来的。”^[4]^[5]

该句子在斯达尔夫人《论翻译的精神》中的法语原文为“Sulla maniera e l'utilità delle traduzioni”,道格拉斯·鲁宾逊在《西方翻译理论》中将其翻译为“On the spirit of translation”。蒙娜·贝克在《翻译百科》中将其翻译为“On the manner and usefulness of translations”。

与斯达尔夫人基本同时的赫尔德、歌德和施莱尔马赫也为提高翻译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过呼吁。赫尔德在《理想的译者就是启明星》中充满热情和希望地谈及翻译对丰富和完善德国文学的重要意义:“一个理想的译者首先是一颗启明星,照亮着新文学。理想的译者就是哲学家、语言学家,也是诗人。一个理想的译者还能找出原作特有的基调,把握住原作创作风格的灵魂所在,使译作的措辞、润色都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5]207}在赫尔德看来,译者作为启明星的作用更在于不朽的译作是对德国文学的永恒贡献,对启迪德国天才作家的思想可以起到宝贵的作用。他还强调译作的语言对丰富本国语言的重要性:“一种语言在经过翻译前如同一个处女……她是纯洁无瑕的,但也是可怜的;未经翻译的原文和一个民族的语言亦如此。”^{[5]208}赫尔德是第一个将翻译象征性地比作“女性”的人,从此翻译的女性特征便成了一个历史比喻,由此还产生了“不忠实的美人”、“翻译是婚姻合同”和“翻译是背叛”等诸多表达。

歌德一生都与翻译有不解之缘。他8岁时就把文科中学最高学年的拉丁文练习题译成德文,此后又翻译过3世纪爱尔兰说唱诗人莪相的诗歌,陶醉于这些诗句中,“并开始创作歌德体抒情诗歌,从此,一种新的德国语言、一种新的文学诞生了。”^{[6]31}。歌德虽没有写过一本完整的翻译理论书,他有关翻译的论文如《论卡莱尔的德国浪漫主义》、《两个警句》、《译者作为媒人》和《谈谈克奈贝尔翻译的卢克莱修的作品》等也散见于他的通信、谈话、书评、自传、格言和语录中,但“如果把歌德对翻译问题的精辟论述汇集、整理起来,已近乎一套自成体系的文学翻译论。”^{[7]135}。

施莱尔马赫特别重视翻译对丰富目的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的重要作用。他在《论翻译的不同方法》中首次将翻译理论与解释学结合起来研究,认为翻译的不同方法就是解释的不同方法,他还详细阐述了翻译与理解之间难以分割的关系。既然翻译不是鹦鹉学舌,也不是机械简单的语言转换,那么翻译就显然比人们想像的要困难得多,翻译者的能动作用也就比人们想像的要大得多,指出这一点毫无疑问有利于提高翻译和翻译者的地位。施莱尔马赫认为:“我们应该承认,德语中许多优美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部分是通过翻译而产生的,部分是通过翻译而引发的。”^{[8]165}

总的来看,自19世纪初比较文学和翻译学在西方世界诞生以来,虽然有上述重量级人物为提高翻译的地位大声疾呼,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翻译和翻译学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流行的观点仍视翻译为小道,是比较文学的辅助工具,在人文研究的殿堂里翻译学的身影也一直若有若无。即就斯达尔夫人等人的呼吁来看,他们主要强调的还是翻译而不是翻译学的地位和作用,这两者之间有一定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要打破比较文学与翻译学关系的既定格局,一方面有待于比较文学和翻译学本身特别是后者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也有待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有待于新的思想文化观念的强有力冲击。

二

20世纪初,美国比较文学研究逐渐发展起来,并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美国学派”。美国学派注重平行比较和理论分析,不再把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局限在相互之间有直接影响联系的文学现象上,而是把所有具备某种可比性的文学现象都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它首先带来的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就是翻译活动越来越兴旺了,因为比较文学研究由“影响研究”扩展到“平行研究”之后,涉及的语种、可以进行比较的文学现象、用以进行比较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关系类型大为丰富,比较文学的课程、研究选题因此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人们开设各种各样的比较文学课程,选择各种各样的比较文学研究题目,涉及的范围面越来越广,研究者们仅仅靠自己所掌握的语种和所了解的文学作品来进行研究和教学已经远远不够,因此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采用翻译作品,这样翻译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但翻译事业的兴旺并没有马上改变翻译的地位,更不用说翻译学的地位。美国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韦勒克(Wellek, R)和沃伦(Warren, A)是美国比较文学的权威,但翻译和翻译学在他们的眼里则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卑微中间人,这就使翻译学在美国比较文学界又一次遭遇了在欧洲的命运。美国翻译研讨班主要探讨翻译中的语言处理技巧,“主要遵循‘新批评’代表人物之一理查兹(Richards, I. A)的细读原则。他们公开声称反对任何理论的束缚,片面强调实践,因此对当代翻译理论的建树贡献甚微”^[9]。

真正使翻译和翻译学的地位及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发生根本转变的是“接受美学”和“解构主义”理论的兴起。1953年,艾布拉姆斯(Abrams, M. H)出版了影响深远的《镜与灯》,提出了文学批评的四大要素,即环境、作家、作品和读者,认为读者的阅读欣赏过程实际上形成了对作品的“二次创作”。几年后,伊瑟尔(Iser, W)和尧斯(Jauss, H. R)提出了“接受美学”,不久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Derrida, J)又提出了解构主义理论,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翻译的看法。

“接受美学”使文学研究由原来只重视作者和作品转到越来越重视文本的接受方——读者。翻译活动也是一种接受过程,原作者、原作与翻译者、译作的关系,是作者、作品与接受者、接受活动关系的具体表现形态之一。根据接受美学的观念,人们从原来只重视原作者和原作转到越来越重视翻译者和译作,认为翻译并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机械转换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创作过程”,一个未经翻译的文本是没有生命力的。译者追求的不再是两种语言的精确对等,而是赋予原作以新生,以及决定赋予原作怎样的新生,使原作语言怎样融入接受语文学。译入语文化的文学标准对原作的重写起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如果一味要求译作在语言上达到高度的准确性和客观性,那译作就只能在学术圈永远沉寂,读者就“看不到译者对译入语文化的贡献,看不到译作的价值和意义,翻译大家也只能‘养在深闺人未识’,而翻译的地位也就无从说起了”^[10]158。

美国诗人兼翻译家埃兹拉·庞德(Pound, E)认为,翻译的自主性有两种体现:既具有阐释性和批评性,又是一种具有原创性的重写。庞德翻译的唐诗引发了20世纪美国的一场新诗运动,具有明显的文学史意义。勒菲弗尔认为:“就译作来说,则主要取决于译者给译作树立了怎样的形象。接受理论认为,译者要对译作的名誉和影响负责,如同原作者要对其作品负责。没有庞德和韦理(Waley, A),中国诗歌不可能在美国享有盛誉。没有康斯坦兹·伽奈(Carnet, C),18世纪俄罗斯文学就不可能进入英语世界。”^[4]18如果没有拉巴萨(Rabassa)的英译,《百年孤独》的生命力也将很有限,因为它只拥有很少的西班牙读者群。加西亚·马尔克斯(Morquez, G)本人也承认,英译本的影响超过了他的西班牙文原著。由此可见,二度艺术可以超越一度艺术,译者和译作对推进文学发展能起到非同一般的作用。

人们关于比较文学与翻译和翻译学、原作和译作之间关系的传统看法,以自柏拉图以来强调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为基础。把破除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作为宗旨的解构主义的崛起,为人们改变这种传统看法提供了契机。瓦尔特·本雅明(Benjamin, W)在1921—1922年间为他翻译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巴黎画廊》诗集写的前言《译者的任务》,使他至今在英美被奉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鼻祖。他在该文中宣称:“原作的生命要通过译作,才能获得不断的新生,并结出十分丰硕的成果。”^[11]172他的观点对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德里达始终关注翻译问题,在许多公开的场合发表过有关翻译的谈话。他的翻译理论主要体现在《巴别塔》中,该文以巴别塔的故事和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为起点,讨论翻译的必要性和不可译性。德里达打破了对原作神圣性的膜拜,并对原作(original)和译作的等级观念提出严厉的质疑,从根本上否定了翻译中两种语言必须准确对等的残余思想。与此同时,他还强调翻译的作用和译作的地位,认为文本一经翻译就成了原作,没有翻译,文本永远只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文本。他认为:“source text(源文)不是

original text(原文),而是一个对意念的详细阐释,因此它其实已是译本。”本雅明和德里达的翻译观消解了原作者和译者、原作和译作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在他的整个解构主义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他看来,翻译学中的结构主义思想根深蒂固,颠覆翻译学理论中强调原作与译作二元对立关系的结构主义思想,就是攻克结构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堡垒。反过来说,德里达很重视通过讨论翻译问题来阐述其解构主义哲学思想。他在《播撒》一书中写道:“我们研究翻译问题就是研究通向哲学途径的问题。”

三

20世纪中期,“文化研究”作为一个重要概念被提出。“文化研究”所说的“文化”不仅仅指体现在艺术等方面的人类的知识和智慧,而是包括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到20世纪下半叶,随着东方文化和第三世界文化的崛起,风行于西方文化界和文学理论界的“文化研究”又发生了一次蜕变,出现了英国“文化研究”理论的创始人F. R. 利维斯(Leavis, F. R.)的精英文学思想,并更多地接受了理查德·霍加特(Hoggart, R.)、雷蒙特·威廉斯(Williams, R.)的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思想。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日益模糊,东方文化和第三世界文化纷纷从边缘走向中心,进而步入主流研究的层面。

文化研究的兴起为重新定义和定位比较文学及翻译学提供了有利的参照。首先,原来比较文学研究注重同一文化传统内部某些文学现象的纵向传承影响,由于这些文化现象之间的文化差异性不是很明显,研究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考察文学作品中的某些主题、人物、情节、结构模式、语言表达方式等的流变上。一旦东方和第三世界文学也被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比较文学研究的重点转到对属于不同文化传统的平行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横向比较,各种文学现象所体现的文化差异性便凸显出来,于是这种差异性及各文化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比较文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而文学的主题、人物、情节、结构模式、语言表达方式等方面的流变则退居相对次要的位置,比较文学研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化转向”。

其次,“文化研究可以给我们的翻译研究提供武器和观察视角,使我们超越于单一的思维模式,因而得出的结论更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和学科意义……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的意义还体现在,它对权力(尤其是语言和文化上的霸权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消除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和等级界限;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天然屏障,使全球文化成为不同文化可赖以对话的一个广阔背景^{[12][139]}。由于此时翻译要面对的是属于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现象,翻译者们越来越感觉到最难处理的不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对不同语言中所包含的文化意义的理解和传达。于是词汇的选用、语序的调整、语言风格的确定等问题不再是翻译学讨论的重点,翻译学研究越来越集中于探讨跨文化理解问题,探讨翻译的历史文化背景、翻译者的文化立场等如何影响翻译者的再创造过程,翻译者如何通过选题、介绍评价、改编、选择和创造词汇、确定译语风格等手段来实现再创造,以及翻译如何在现实社会文化发展中发挥种种作用等。于是翻译学在此实现了由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1990年率先提出的“文化转向”。这一观点认为:“回顾西欧对翻译的传统思考,我们意识到将翻译局限在语言层面上不足以反映翻译的复杂性,因为在翻译所受的诸多束缚中,来自语言的束缚是最不重要的。而对传统的了解,对意识形态的认识,不仅能使我们关注常规的翻译问题,还能让我们关注翻译研究如

转引自苏珊·巴斯奈特《从比较文学到翻译学》,载陈德鸿、张南峰编译《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页。

转引自BARNSTONE W. *The Poetics of Translation: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26.

何更有效地促进整个文化研究。我们这才开始意识到,翻译应该在文化历史中占据一个更为重要的中心位置。^[13]并且,1997年在荷兰莱顿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十五届年会上,有学者开始提出“以文化翻译”来代替“字面翻译”的命题^{[14]316}。

总之,在文化研究的学术思潮冲击下,比较文学研究和翻译学研究都发生了重要转变,但两者实现所谓“文化转向”后的命运并不一样。因为文化研究借鉴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了权力关系和文本产生过程中的文化霸权等问题,揭示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等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相对来讲,比较文学研究历来比较重视西方文化传统内部的文学研究,面对文化研究所倡导的思潮,它显得难以适应。一些比较文学研究者仍然固守原有的立场,将大众文化、非主流文化、译文等都排斥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外,这就使比较文学研究日益脱离时代潮流。当然,更为人们接受的观点是“比较文学的身份正在发生转变,这并非坏事,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模糊界限为比较文学提供了一个反思自身和重新考虑自身发展的机会”^{[15]114}。

翻译学则没有比较文学研究那样的传统包袱和顾虑,它本身就是因为打破原作与译作、西方精英文化与东方和第三世界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格局而得以兴盛起来的。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有很多共性,比如说,它们都对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的界限提出质疑,都对文学经典提出了挑战,都强调特殊语境下的文学功能,都抨击文化话语霸权,等等。因此,当“文化研究”的潮流涌来时,翻译学研究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例如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就结合翻译实践对翻译过程进行了研究,了解操纵文本产生过程的复杂性,还通过对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等作家的经典作品的译介情况的比较研究,就文化价值和理想的构建以及这些价值代表了谁的利益等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他们认为:“翻译总是卷入存在于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境中的权力关系之中。对译者来说,解读一个文本绝不仅仅牵涉到语言问题……如果翻译多关注个体文本与产生和阅读这些文本的更为广泛的文化系统之间关系,那么,我们就会对翻译研究在文化研究、特别是后殖民理论研究中越来越被看作是实践和隐喻不足为奇了。”^{[16]137}总之,翻译过程最生动地体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翻译学所要研究的,也是文化研究所要研究的。这也使文化研究不但对翻译研究刮目相看,而且还越来越依赖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由此,翻译研究渗透到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和后结构主义等理论中,成为包括德里达、米勒、伊瑟尔、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在内的当代思想大师们都经常谈及的话题。

比较文学和翻译学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比较明显的此消彼长态势。翻译学已不再从属于比较文学,比较文学反而离不开翻译学,比较文学和翻译学不再有高低之分。比较文学和翻译学都要研究文化问题,比较文学因其一贯偏重西方文化传统的立场而对此有点力不从心,翻译学则因其具有反叛传统的品格而对此得心应手。翻译不再被狭义地理解为只是语言之间的转换,而被看成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交流、交锋。从观察剖析翻译过程入手,探讨不同文本、不同语言所代表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文化研究最重要的阵地和最佳途径。比较文学要从事文化研究,就不得不越来越依赖翻译学,翻译问题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关键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研究者再也不能轻视翻译学,而是纷纷向翻译学示好。乔治·斯坦纳(Steiner, G)和艾琼伯(Etiemble, R)指出:“翻译不单纯是被韦勒克和沃伦带有几分傲慢地看成是那种狭义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卑微的中间人,而是比较诗学的一块试金石。”^{[11]149}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比较文学已经过时了,它的地位应该被翻译学所取代。巴斯奈特曾大胆断言:“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了。女性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和文化研究这三个方面涉及的跨文化研究,已经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要学科,并把比较文学视为其中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范围。”^{[2]194}他进一步指出:“目前翻译学的蓬勃发展,证明了这门一向备受冷落的

‘边缘’学科的强大生命力。由于它利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已成为一门跨学科的学问……现在已经很难把翻译学视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了,因为‘比较文学’这个名词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多少意义),而且,翻译学是一门朝气蓬勃的学问,而依赖结构主义的比较文学则正江河日下。^[12]希勒斯·米勒(Miller, H)在清华大学发表题为《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的演讲时也说:“比较文学的永久危机不在于理论或方法论上的分歧,而在于翻译的问题。这里的翻译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其中心问题并不是‘理论’,而是难以解决的翻译问题,无论是语言之间的翻译,文化之间的翻译,还是从一亚文化到另一亚文化之间的翻译,都十分令人棘手。”^[17]

四

不可否认的是,关于比较文学、翻译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走向,现在存在着多种意见。上述巴斯奈特和米勒等人的意见只是其中的一种,或者说只是其中比较前卫的一种。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情形远没有如此明晰。比较文学虽然一如既往地继续遭到人们的质疑,但毕竟已在文学研究领域内获得了合法地位。在我国现有的学科设置目录中,比较文学是一个二级学科;在世界各国的大学中,也普遍设有比较文学系。相比之下,仍然认为翻译学只是探讨翻译的技巧和经验者还大有人在:“即使是传统学科中某些知名度很高的学者听说翻译不只是文字转换时,他们也会流露出惊讶的表情……”^{[18][132]}因此,翻译学的地位仍然不如比较文学高。在世界各国的大学中,设置翻译学系的也还没有设置比较文学系的多。直到1998年,美国坦普大学著名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谈到翻译的处境时,仍然无法释怀。他说:“翻译的窘境体现在文化、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当人们问及为什么今天翻译仍处在研究、评论和辩论的边缘时,特别(但不是绝对)是在讲英语的国家,这种窘境就凸现出来了。对这种边缘状况的描述恐怕给人的印象是,没完没了地抱怨翻译如何受到难以置信的不公正对待,遭受了怎样的伤害。翻译作为一种书写形式蒙受耻辱:版权法使之受挫,学术界使之受贬,出版商、出版公司、政府机构和宗教组织则利用之牟利。”^{[19][1]}轻视翻译学的情况依然相当普遍,令人不得不对传统观念的积重难返再次发出感叹。

还必须注意的是,导致比较文学和翻译学发生文化转向,并由此引起它们两者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文化研究学术思潮,近年来已显颓势。因为文化研究与解构主义等一样,都属于后现代思潮,都抨击逻各斯中心主义,反结构、反中心、强调文化多元化等等,这与20世纪中后期的特定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20世纪末,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人们发现曾经猛烈反对过的结构、中心以及科技、经济、军事、文化强权等,仍然牢牢地掌握着自己的权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它们甚至比以前更加无孔不入地控制着这个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卷土重来,傲睨天下,“文化研究”、“解构主义”的倡导者和追随者们激愤不已,却又无可奈何,不能不感叹文化的乏力、解构的徒劳。除了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外,解构主义、文化研究等本身在方法论上也存在一些根本性缺陷。比如解构主义一路解构下去,颇有犁庭扫穴的锐气,但解构完了又怎么办?它下一步的出路何在?如不建构,它无法解释现实世界,它将失去现实有效性;如有所建构,则它将自己否定自己。又如文化研究,当它把人类社会几乎所有的现象都纳入研究的范围后,就没有了自身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变成了一个空壳。在文化研究观念的引导下,人们注意去观察、挖掘过去不太关注的某些文化现象,其中固然不乏可喜的发现,但也确实出现越来越趋于边缘、零碎的倾向,解释和改造世界的有效性大大降低。人们对文化研究、解构主义的热情已有所下降,哈佛大学等机构已将“文化研究”的科目重新改回为传统的“人文研究”,这无疑是值得注意的信号。总之,迈入21世纪后,文化研究、解构主义等后现代思潮呈现出衰退、迷惘的态势,得益于它们的翻译

学是否也会受到牵连,看涨的势头是否也会回落呢?

但无论如何,解构主义打破了人们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迷信,文化研究则拓展了人们观察社会现象的视野,它们的历史功绩是无法否定的。经过“接受美学”、“解构主义”和“文化研究”等的洗礼,比较文学已不是原来的比较文学,翻译学也不再是原来的翻译学,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原来的主仆关系,这些是毋庸置疑的。由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比较文学、翻译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的格局及其发展走向大约不出两种情形:一种是重新定位,一种是三位一体。所谓重新定位,即指它们三者在各自确立自身的立足点、圈定自身的研究范围的基础上,重新排出座次,确定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至于具体会形成怎样的一种关系,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判断。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一般认为文化研究可以囊括比较文学和翻译学;有些比较文学的学者则仍然认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和翻译学之间有高低之分;许多翻译学的学者和重视翻译学的学者则认为翻译学已取代比较文学,或在重要性上已超过比较文学,足以与文化研究分庭抗礼,至少可以在文化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所谓三位一体,是指三者在进一步明确各自的特征和功能之后,形成一种既各自独立,又融为一体的特殊关系。由于文化研究、比较文学、翻译学都把研究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它们在这点上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叠交叉,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从它们现在发展的某些迹象来看,将来文化研究有可能侧重于探讨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翻译学研究则从剖析翻译过程入手,侧重探讨不同语言系统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和翻译目的;由于经过蜕变而崛起的翻译学已挤占了部分比较文学的领地,比较文学也许会做出某种调整,在一定程度上退回它的传统,侧重于探讨不同时代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和影响。简单地说,文化研究侧重于“上与下”,翻译学研究侧重于“左与右”,比较文学侧重于“前与后”,既分工又合作,构成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现象的几个维度。它们的相互关系究竟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我们拭目以待。

[参 考 文 献]

- [1] 布吕奈尔. 什么是比较文学[M]. 葛雷, 张连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 [2] 陈德鸿, 张南峰. 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 香港: 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0.
- [3] ROBINSON 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2.
- [4] LEFEVERE A. Introduc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J].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95, 47(6): 1 - 10.
- [5] HERDER J. G. The Ideal Translator as Morning Star[A]. ROBINSON D. E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C].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2.
- [6] 艾米尔·路德维希. 歌德传[M]. 甘木,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 [7] 杨武能. 歌德与文学翻译[J]. 中国翻译, 1999, 137(5): 35 - 39.
- [8] SCHLEIERMACHER F. 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C]. LEFEVERE A. 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 A Sourcebook.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 2004.
- [9] 郭建中. 美国翻译理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10] 谢天振. 比较文学与翻译学[M]. 台北: 业强出版社, 1994.
- [11] BENJAMIN W.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A]. HANNAN A. Illumination Edited[C].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68.
- [12] 王宁. 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 [13] LEFEVERE A. 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 A Sourcebook[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 2004.
- [14] 王宁. 全球化: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15] REY C. In the Nam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BERNHEIMER. C.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C].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6] BASSNETT S, LEFEVERE A.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 2001.
- [17] 米勒. 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N]. 李元, 译. 中华读书报, 2003 - 10 - 22(11).
- [18] SNELL-HORNBY M.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19] VENUTI L. The Scandal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责任编辑 何海峰]

Reorientation or Trinity ?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ranslation Studi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TAN Hui-ju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used to be regarded as a trifling skill and as nothing but a tool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t is the reception aesthetics and deconstruction theory that have helped to break the conventional hierarchies in relation to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target language. Thus translation is reckoned not just as a linguistic transfer but as a creative rewriting, and translation research is likewise no longer considered just a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techniques between different languages, but the interchange of cultural element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herefore, the academic standing of both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been greatly enhanced.

The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represented a marked shift towards the study and criticism of the unequal relations between mainstream and marginal cultures, between elite and popular cultures, and between occidental and oriental cultures, and promoted a cultural turn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both of which, being heavily influenced by cultural studies, focused more o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inter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texts and language systems. As the research scope of the fundamentally changed translation studies is tremendously broadened and deepened, to scrutinize and dissect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purpose is deemed an important field in and the best approach to exploring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so the place and the func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ave been, to a certain degree, superseded by translation studies. They have both taken turns to be the centrality or the marginality in the academic field.

The 21st century has witnessed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erms of their features and correlation. They are developing in a structure of being independently overlapping, intricately intertwined, and unavoidably cooperative. The preponderanc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ove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esumed by some scholars, is a question still up in the air and awaiting a further debate.

Key words: comparative study; translation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reorientation; trinity